

## 揭发声讨“四人帮”及马、徐、王 破坏生产建设的罪行

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统计组负责人 韦 明

“四人帮”以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疯狂地对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肆意破坏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罪行累累。但是，在马、徐、王的揭发、交代中，竟然只字不提，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这里我代表市革委会工交组和综合计划统计组向大会作揭发批判：

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奋发图强，辛勤劳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疯狂进行捣乱、破坏，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企业的管理搞乱，把国家的计划搞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他们的破坏，我们的生产建设会搞得更好，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这几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上海基本建设投资不断增加，职工人数逐年增加，而生产发展速度逐年降低，积累水平年年下降。工业生产每年递增速度，从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下降到今年预计只有百分之××。近三年，工业产值增长的绝对数，还没有基本建设的投资多。国家下达给上海的财政收入计划，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完成。有些产品质量下降，自己不抓，部里抓了，他们还要骂街、扣帽子。轻工业部检查了上海的一个产品质量问题，张春桥知道了，竟大骂轻工业部，说“这是一个大阴谋”。重大生产交通事故逐年上升，每年因事故损失达几百万个工作日。主要产品的燃料、材料和电力的消耗不断上升，浪费严重。基本建设不问是否必需，不顾是否合理和可能，乱批项目，长期打消耗战，胡子工程（指时间拖得很长的工程）越来越多。

对这些严重问题，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十分焦急，非常痛心。但是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谁要是持有不同意见，就要被他们打棍子、扣帽子。在“四人帮”的统治下，扎扎实实搞生产、做工作的，都是唯生产力论，都是路线斗争觉悟低，都是罪人；那些说空话，搞阴谋，吃喝玩乐，腐化堕落的，倒成了最革命的。“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的胡作非为，严重压制了干部和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搞得“坏人

神气,群众受气,干部泄气”。有些老工人说:“干倒干不死,气倒气死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对“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破坏生产建设的罪行,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清算!

“四人帮”竭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他们在各种场合散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把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张春桥讲:“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王洪文讲:“这几年我们没有抓生产,生产照样上去了。”他们把抓生产,做实际工作,污蔑为经验主义,是路线觉悟低。他们还把搞生产和唯生产力论等同起来,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辟倒退”、“穿新鞋走老路”的帽子。污蔑“工作上辛辛苦苦的人”,“路线上必然是糊里糊涂”。你一抓生产,就说你是“唯生产力论”;一抓管理,就说你搞“管卡压”;学一点技术和文化,就说你走“白专道路”。革命与生产、依靠群众与加强管理、红与专都是辩证的统一。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任何时候都要把革命放在首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政治挂帅下,努力掌握生产本身的规律,解决生产中的矛盾。不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生产怎么能自然而然地上去呢?“四人帮”以及马、徐、王那种做法,搞得广大干部想抓生产又不敢抓生产,结果破坏了生产,也破坏了革命。

“四人帮”及马天水,经常散布什么:经济工作不要抓,企业管理不要抓,只要搞搞大批判,生产自然而然可以上去。马天水一再宣扬:“上海的钢铁生产是靠批唯生产力论上去的。”我们要问马天水,这几年上海的钢上去了吗?全国的钢铁生产,被“四人帮”破坏得非常厉害,上海的钢铁生产,也被“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破坏了。冶金系统广大干部和工人,是积极要把钢铁生产搞上去的,他们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发展工业以钢为纲的指示,在一九七一年打破了十年徘徊,一九七三年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这几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把人的思想搞乱了,弄得广大干部不敢抓管理,不敢抓质量,对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不敢坚持,年年完不成计划。钢铁下来了,“四人帮”是高兴的,张春桥说:“我早就讲过了,不要怕降低速度,下降也可以”。有一个钢厂的转炉车间,一个月的生产事故多达××多次,产量几年上不去。今年春节前,因为屋顶的积灰长期没有人负责清理,以致越积越多,最厚的地方竟有一米九,比一个人还高,造成厂房倒塌,停产了一个半月,少炼钢七万多吨,这难道是“生产自然而然上去了”吗?

“四人帮”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而且在行动上对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单位、先进工人进行压制和打击。比如，上海异型钢管厂，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柯庆施同志树立起来的八面红旗之一。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一直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工业学大庆”，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很好，但却被“四人帮”及马、徐、王污蔑为“生产典型”。这个厂有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在王洪文的怂恿下，在批林批孔中兴风作浪，污蔑厂的领导是“杀少正卯的孔老二”，“右倾复辟思潮的总代表”，要批判、要打倒，搞得全厂不得安宁，生产一度大幅度下降。

又如，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有个织布女工毛信贤，连续二十七万米无次布，去年四、五月份《文汇报》发了一个内部情况，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看到后，批示要学习毛信贤同志这种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北京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带了二十个人专程来向毛信贤同志跟班学习。这件事给王秀珍知道后，她大为恼火，把《文汇报》这份内部情况污蔑为“毒草”。马天水还打电话给纺织局党委负责人，追查这是局里什么人向报社提供材料的，并追查毛信贤同志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妄图进行迫害。这样的先进人物，不仅得不到表扬，反而成了罪人。我们要问马天水、王秀珍，你们在搞哪个阶级的专政？你们不仅是要迫害一个普通的工人，更阴险毒辣的是在猖狂攻击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

“四人帮”就是这样从思想上、行动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们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完全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死敌。

## 二

“四人帮”疯狂对抗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竭力破坏“工业学大庆”，煽动无政府主义，把企业管理搞乱。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根本大法。它正确地回答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领导与群众、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而“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竭力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姚文元提出：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讲相互关系。根据这个黑指示，姚文元的秘书带了写作组人员到一个工厂去调查，又经过马天水、黄涛、朱永嘉等人的周密策划，上海两报为此专门发表了论述“三讲”的社论。马天水赤膊上阵，亲自修改社论，把社论中坚持“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的提法，全部砍掉。马天水还到厂里洋洋得意地说：“这篇社论是市委改的，‘三讲’经验是有针对性的，现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有股复辟倒退的思潮。”这个“三讲”，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些基本原则，是针锋相对的。它只讲生产关

系，不讲生产力，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企业要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反对要有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完全不符合这个厂的实际情况，理所当然地遭到这个厂广大干部、工人的反对。工人说：我们厂的产量年年上升，这几年质量不断提高，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贯彻“鞍钢宪法”的结果，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什么“三讲”，我们只知道毛主席讲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四人帮”及马、徐、王炮制的“三讲”经验，所谓讲路线，就是要人们跟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所谓讲相互关系，就是把干部与群众对立起来，上级与下级对立起来，抹煞人们相互关系的阶级性；所谓领导权，就是要“改朝换代”，以“帮”代党，取消党的领导，把领导权掌握在他们那一帮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手里。大家都知道，在轻工业局掌握领导权的马振龙，就是一个称王称霸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贪污、盗窃了广大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专供“四人帮”和他们一伙挥霍享受。粉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以后，在他的一个柜子里，就搜出了六百多种轻工业产品，价值三万多元，其中手表就有九十多只，还有现金七千多元，是一个罪证确凿的大贪污犯、大盗窃犯。这个人，也是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一个骨干分子。“四人帮”讲领导权，就是要巩固这些坏蛋的领导权。象马振龙这样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工交系统还有黄涛、陈阿大、戴立清，这些人整天不干正事，专搞阴谋诡计，吃喝玩乐，腐化堕落。对这些人，广大干部、群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也有人检举揭发过他们，而马、徐、王蓄意包庇，王洪文说得更加露骨，他说：“这些人无论如何要保住，关键时刻要依靠他们。”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所说的讲领导权的反动实质是什么。

“四人帮”竭力反对、破坏“工业学大庆”。一九七一年十月，张春桥曾经阴阳怪气地说过：“学大庆究竟怎么样？这件事我有些怀疑”，“大家都讲学大庆，但不得要领。”他还污蔑说：“我看大庆人也被人家弄得糊里糊涂。”马天水、黄涛紧紧跟上，胡说什么：“两论起家提法不确切”，“三老四严是提倡奴隶主义”，“强调岗位责任制是修正主义”。王洪文说：“我们要总结上海一套完整经验。”马天水、黄涛也说：“大庆是一个点，上海是一个面。学大庆主要是总结自己的经验。”他们妄图把毛主席树立的大庆这面红旗砍倒。一九七五年，国务院决定要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这时，他们又打着学大庆的旗号，大干为“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等人树碑立传的罪恶勾当。他们对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一些先进单位冷眼看待，对扎扎实实学大庆搞得好的单位不去总结。如上棉三十三厂（即原来的嘉丰棉纺织厂），十几年来如一日，坚持总路线，坚持高质量，产品得到有关部门“免验”的荣誉，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受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赞扬，一九七一年周总理在广交会上再次赞扬这个厂的产品在东南亚市场上得到好评。但是，在评选学大庆先进单位时，马、徐、王却要把它拉下来，后来经过下面同志的力争，才不得不放上去，排列在四十个先进单位的倒

数第三名。同时，他们又别有用心地把另一些厂拉上去，为他们树碑立传。

企业管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同时，也要解决生产斗争中的具体矛盾，包括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搞好经济核算，开展劳动竞赛、技术革新等等。但是“四人帮”以及马、徐、王，他们把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制度万能”、“管卡压”。张春桥还诡辩说：“毛主席只讲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讲过要建立规章制度。”他们对于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加强管理、发展生产的先进单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扼杀。如有一个化工厂，前几年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经济核算问题的教导，经济核算搞得很好，取得了多快好省的新成绩，先后在全国许多会议上介绍过经验，还得到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赞扬。对这样好的先进单位，马天水、黄涛却污蔑他们是“业务挂帅”、“单纯经济观点”，批评厂党委领导同志到外面去开会学坏了。结果使这个厂对如何搞好企业管理产生了两种观点，引起思想混乱，经济核算工作受到影响。这完全是马天水、黄涛造成的。

“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对先进单位是百般压制，而对那些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坏事，却百般怂恿。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对流氓阿飞打群架，要严肃处理，张春桥竟表示反对，他胡说：“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打架，他们有长处，将来打起仗来会很勇敢。”在另一次会上，有同志向张春桥汇报时讲到，有个别青年工人不遵守劳动纪律，生产时间不干活，到外面去捉蟋蟀，而且屡教不改，群众意见很大。张春桥竟回答说：“不要批评，领导干部应当同他一起去捉蟋蟀，先培养感情，而后再做思想工作。”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四人帮”就是打、砸、抢和无政府主义的总后台！

### 三

“四人帮”竭力破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所欲为，胡作非为，把国家统一计划搞乱。

“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对待国家安排上海的生产任务和建设项目的态度，是根据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而转移的。比如，一九七三年，交通部根据全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需要，先后两次向上海提出，并正式来文，要上海生产三百吨大平板车，但他们置之不理，拒绝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交通部于一九七四年准备向国外进口大平板车。这时，黄涛一反原来的态度，大叫大嚷说：“上海能制造，为什么要进口？”“我们要争气！”广大工人克服种种困难，把大平板车造出来以后，黄涛竟然把工人群众创造的这个成绩作为炮弹，在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发动进攻，以大批崇洋迷外为名，把矛头指向国务院和有关部的领导同志。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汽

车行业工人访问了很多矿区,看到他们迫切需要重型汽车,回来以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造出了三十二吨矿用载重汽车。开始,马天水、黄涛等人出于他们树自己、打别人的政治需要,大加宣传。但到后来,国家计委几次要上海扩大生产,并且主动提出给条件、给投资,而黄涛又无理拒绝,说:“我不听他的,上海不搞,不搞就是不搞。”马天水、黄涛等人,他们哪里是在抓生产,完全是在搞阴谋诡计,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经济大权,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

“四人帮”以及马、徐、王,还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滥搞基本建设,为自己树碑立传。在上海就有那么一批所谓“王洪文工程”、“王秀珍工程”、“陈阿大工程”等等,厂里工人、干部很有意见,有关部门也不赞成,马天水、王秀珍、黄涛串通一气,硬要列入计划项目。上海龙华苗圃,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少搞盆景盆花,多种树木、果树的指示,准备改建一个小型植物园,而江青为了寻欢作乐,授意马、徐、王任意扩大建设规模,要种什么奇花异草,搞什么亭台楼阁。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王洪文又窜到苗圃,说什么:“有人讲种花、搞盆景会变修,我看不见得。”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个新建工程,按原设计一个厂分三个车间,后来马振龙提出“和尚多了,没有庙,我有一批人要当厂党委书记,不愿当车间总支书记”。陈阿大就来个因人设厂,把三个车间分为三个厂,各搞一套食堂、浴室、检修车间等附属工程,并用好几道围墙隔开,一个厂开了六个大门。

“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对于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项目拚命上,而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建设项目,漠不关心,甚至捣乱破坏。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国家有几个重要的国防尖端产品,都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列入国家计划,由周总理亲自抓的。他们当面接受,暗中抵制,不组织,不研究,一拖再拖。对于事关人民生活的一些建设项目,他们漠不关心。就拿工房来说,广大劳动人民迫切要求多建一些,但张春桥在一九六八年说:“工房不要搞”。黄涛在今年八月也说:“工房搞多了。”几年来,他们对医院、浴室、菜场、公共交通、煤气、自来水、道路等等,更是敷衍应付,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四人帮”以及马、徐、王,他们还大搞独立王国,处处凌驾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之上,根本不把国务院、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放在眼里。他们对国务院发下来的有些规定、通知,拒不执行。例如,在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为了加强基本建设管理工作,要大家讨论国家建委草拟的一个文件,马天水就胡说,“这是老一套,老框框,搞管卡压”,拒绝讨论,把文件退了回去。会后,国务院把这一文件批给各省市试行,我们打报告建议印发有关部门,马天水又蛮横地批示“不翻印”、“不转发”,进行抵制。马天水,你这样疯狂地抵制国务院的文件、规定,安的是什么心?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目无中央,自搞一套,胡作非为,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拿大中型建设项目来说，国务院规定都要上报国家批准，但你们很多项目都不上报，擅自安排建设。今年上海基建计划的大中型项目中，就有三十个没有上报审批。甚至象新辟漕泾工业区这样的大项目，都是自作主张，少数几个人说了算。由于“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大搞独立王国，为所欲为，把上海的基建摊子铺得很大，战线拉得很长。已经批准的基建项目，按照现有建设力量，今后新项目一个都不安排，“五五”期间也完成不了。造成许多都是半拉子工程，长期打消耗战，严重地浪费了国家的建设资金，破坏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四人帮”在经济战线上干了大量坏事，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他们妄图通过抬高上海（就是抬高他们自己），搞乱外地，攻击中央，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以达到“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事实证明，不打倒“四人帮”，我们就要亡党亡国，不彻底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被粉碎了，“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妄图把上海作为他们反革命基地的黄粱迷梦破产了。广大干部和群众长期受到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片大好。十月中旬以来，生产水平不断上升，十月份的钢产量达到今年最高水平，全市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点五，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的情况也很好，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正在掀起。大家决心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彻底批判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他们的流毒。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努力增产，厉行节约，把“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被他们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补上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

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印发

---

(共印 530,000 份)